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国家制度 与古代社会研究

Guojia Zhidu
Yu Gudai Shehui Yanjiu

国家与社会
财政与经济

方志远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国家制度 与古代社会研究

Guojia Zhidu
Yu Gudai Shehui Yanjiu

方志远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方志远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8725-8

I. ①国… II. ①方… III. ①国家制度—中国—文集②古代社会—社会变迁—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D62-53②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132 号

策划编辑 王 茵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6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

文化进程总是和经济发展同步。

岱岳齐鲁的富庶，孕育了孔孟诸贤；中原大地的繁华，造就了三晋英豪。关中的沃野千里，更营造出汉唐雄风。

尽管徐孺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自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西尚为“蛮荒之地”。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应是江西的意外之喜，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而且，将“徐孺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行进。

唐中期开始发生的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国内的交通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的改变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①本来夹在吴楚文化之间，说是“吴头楚尾”却既非吴又非楚的江西，在这个时期超越“荆楚”，与

^① 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笔者《江西通史·明代卷引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另见许怀林教授《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吴越”一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又与“湖湘”共同构成中国最稳固的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当人们正为晏殊父子蜚声词坛而钦羨、为欧阳修独步文苑而仰止、为王安石策划国是而疑惑之余，更加惊讶地发现，后面接踵而至的，竟然是长长的一列的一流文化人：曾巩、黄庭坚、陆九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文天祥、马端临、吴澄、朱思本、周德清、解缙、杨士奇、吴与弼、罗洪先、魏良辅、颜钧、何心隐、汤显祖、朱耷（八大山人）、蒋士铨。当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江右文化大军，连同着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江右王门以及《文献通考》、《岛夷志略》、《广舆图》等等，密集而持续地产生影响时，怎么可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文章节义之邦”、“家孔孟而人阳明”之美誉遂纷至而踏来。^①

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层面的支持。“淡水浸铜法”、《禾谱》、《茶经》、《陶录》，特别是《天工开物》，既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启示。丁文江院士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后，解释了当年身为“县学教谕”的宋应星竟然能够编著《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原因：“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②

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江西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前后五百年间，数百上千万的江西人口涌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成为持续影响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他们在这里开垦荒地、发掘矿产、交流物质、传播文化，与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移民和土著居民一道，造就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然遗存的几百处江西会馆（万寿宫）、临交会馆（萧公庙、晏公庙）、吉安会馆（文公庙）、抚州会馆（昭公祠）、药帮会馆（三皇宫）……见证了当时的辉煌。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因收缴“伪书”发布“上谕”：“江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哲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0《朱子建宁门人并交友》。

② 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载武进陶氏编《天工开物》。

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藪，民间书籍繁多。”^①可见直到此时，江西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文化发达之域。

但也就在此时前后，江西缓慢了自己行进的步伐，不仅落后于吴越，且开始被湖湘赶超。特别是“五口通商”及京汉、粤汉铁路开通之后，国内交通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大运河通航以来的根本性变化，江西从交通格局的“中心”被甩到了“边缘”。从外部涌入的新思潮、新风尚、新的生产方式，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致使江西在理念的更新和经济的转型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交通格局中的边缘化以及理念转换、经济转型的迟滞，直接导致了江西近代文化的落后。

虽然在20世纪，仍然产生了陈寅恪、吴有训、傅抱石这样伟大的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但从整体上来说，江西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一样，相对一骑绝尘的吴越、早已国门洞开的闽粤，以及民风大开的湖湘，其封闭与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

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成为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也是江西在抗日烽火中给全国展现的文化曙光。

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为学校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

虽然校长对于学校远景的描述不无鼓舞人心的苦心，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它的感召下，大批江西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历史系也是人才济济，他们之中，有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卓尔不群的逻辑学家吴士栋，有梁启超先生的高足、著述等身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有清华十人史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兵制史和经济史家谷霁

^① 《清高宗实录》卷1304，乾隆五十三年（1788）。

光，有对学术一丝不苟、锱铢必较的度量衡史和秦史专家谢康，有追随西南联大南北奔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明清史专家欧阳琛等。他们以自己的文章气节，开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和献身社会的人文精神。

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胡先骕校长为学校描绘的远大前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学校发展屡经曲折，名称也几番变更：始由国立中正大学改名南昌大学（1949年），再经院系调整改名江西师范学院（1953年），最终定名为江西师范大学（1983年）。其间虽然不乏杰出学者和优势专业，但从整体上说，由“国立”中正大学而为“省属”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虽然是“省属重点”，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客观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边缘化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江西的一所高校、一个个体的边缘化，而是江西的高等教育、江西的文化事业，从晚清以来所经历的再度边缘化，其后遗症迄今没有消除。而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再度边缘化，对于江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但迄今同样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虽然如此，江西千百年来培育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依然在激励着江西师大的师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拥有三个校区、4400亩土地，融教育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及音乐、体育、美术等特殊专业于一体，有全日制本专科生近4万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近2800名，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发展正在显示出良好态势。

在迎来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既无博士点，也非教育部重点基地的历史学的学者们，仍然可以问心无愧地向校庆献上他们的贡献。

一方面，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今天江西的土地上，县级以上中学的高中部，每100名历史教师，有近70个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在江西的市县级博物馆馆长中，有一半以上曾经受训于江西师大历史系。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江西师大历史系为各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输送了近500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大批博士研究生。

另一方面，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索。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商品经济研究》，许怀林的《江西史

稿》、《江西行政志》，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梁洪生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梁民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邱新有的《村治中的宗族》等，都是集多年研究的力作。而11卷近500万字的《江西通史》的完成和出版，更集中展示了这个学术群体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江南腹地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大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在30多位专任教师中，有28人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京、津、沪、宁、汉、穗及其他各地高校，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潜心研究，形成了一支颇具声势的学术新军。他们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当然传人。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谢宏维《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士绅与地方政治》等著作的整体推出，既反映了这批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预示着这个学术群体由“单兵作战”到“集群作战”的进步。

三

在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这个学术群体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论文，结为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出版，作为向七十年校庆的一个汇报。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收录了方志远、陈晓鸣、谢宏维、温乐平等人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从具体的个案入手，对秦汉、明清时期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国家财政与地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

《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收录了万振凡、游海华、邱新有、戴利朝等人的 22 篇论文。这些论文以苏区革命为中心，分别对苏区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江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变迁进行讨论。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收录了张艳国、王员、刘劲松、蒋贤斌等人的 28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演变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度透视。

《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洪生、李平亮、游欢孙、廖华生等人的 14 篇论文。这些论文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解读，以江西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宋代以来区域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变化作出了新的解释。

《史学观念与欧美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民慷、张艳国、孟海泉、徐良、李昌新、杨长云等人的 20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欧美社会的史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代审视，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参照系。

这套史学文丛与建校 65 年选编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不同，前者试图展示本学科的学术传承，所以收录吴士栋、姚名达、谷霁光、谢康、欧阳琛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而今次所收录的，均为在职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学术境界、学术方法上的追求和进步。

论文的结集出版，其实是一件十分奢侈而艰难的事情。所以，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院之长和作者之一，当我承担写“总序”任务时，并没有太多的快感。

出版经费的筹措颇费周折，但方方面面的支持令我们感动。如果一一列举其中的友情和热情，反而显得客套和俗气。

主要的顾虑倒是，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有多少成果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磨洗？敝帚自珍的些许创见，投放于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长河之中，是否算得上是沧海一粟？

但是，沧海正是由点点滴滴而汇成，经典也是由平平凡凡而凝练。当这些点点滴滴汇入涛涛巨流，当这些平平凡凡融入传世经典，小我也就成了大我。设想，如果没有大批像江西师大历史学这样的非“985”、非“211”院校学者们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三十年历史学科的发展是难以想

象的。

徐孺子当年的影响力比起陈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徐孺子既没有因为身居“蛮荒”之地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陈蕃为其下榻而受宠若惊。而他的自尊自强、宠辱不惊，竟然成为此后江西文化、江西学术的核心品质。从这一点来说，王勃在《滕王阁诗并序》中的赞赏或许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诂知这批成果的结果出版，不会成为江西历史学振兴的前兆？

一念及此，稍稍心安。权作序。

作者谨识

己丑岁末

目 录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1)
---------------------	-----

国家与社会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3)
“山人”与晚明政局·····	(37)
明代苏松江浙人“毋得任户部”考·····	(81)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与地域文化的转移·····	(110)
棚民、土著与国家	
——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	(146)
化干戈为玉帛	
——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	(164)
试说秦汉社会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	(197)

财政与经济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	(217)
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	
——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一·····	(239)

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	
——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二·····	(260)
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279)
汉代江南城市与商业问题述论·····	(292)
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	
——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	(306)
秦汉时期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	(322)
后记·····	(338)

国家与社会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方志远

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①，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②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③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

① 傅衣凌教授《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一文认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② 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明前期的“严肃冷酷”，有关研究围绕着明太祖建立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及“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理念而展开，大陆学者陈高华、陈梧桐，中国台湾学者黄彰健、杨树藩等人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吴晗自陈，其著《朱元璋传》的初衷就是揭露其专制的严酷性。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将眼光转向晚明，刘志琴、冯天瑜、万明等人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其实，谢国桢先生早年著《晚明史籍考》已开其端，其高足商传教授近年更多有创见。

③ 这种研究断裂不仅仅发生在明代，至少也发生在清代。当清史研究者正津津乐道康乾盛世时，近代史研究者却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衰败。

的历史走向。^①

一 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②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③，所以，姚旺的传升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关注。

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为太医院御医施安等十一人升官加俸。^④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当时也无人在意。

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1465）八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敦、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的是品官中最低级别的匠官，施安等人是在本系统内升迁，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

^① 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著作也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美]牟复礼、[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限于体例和篇幅，都未能进行深入讨论，一些史实也存在错误，这些将在后文予以说明和辨析。

^② 《明宪宗实录》卷2“天顺八年二月庚子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53页。

^③ 《明太宗实录》卷232“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2244页；郑晓：《今言》卷1之8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

^④ 《明宪宗实录》卷2“天顺八年二月戊申条”，第55—56页。

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便难以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①。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仍然不会去关心姚旺、施安乃至李景华们的升迁。但事态的发展，令时人瞠目结舌。

姚旺之后，成化二年十月，传升工匠徐瑞为锦衣卫所镇抚、朱贵为营缮所所丞。^② 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从此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十六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③ 传奉匠官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天顺八年十月，传升道录司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④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传升道士胡守信等十五人官，其中既有在道录司任职的道士，也有京师灵济、朝天、延祐等宫观的道士。^⑤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传升京师大隆善护国寺番僧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番僧结瓦领占为禅师、锁南舍辣为右讲经。^⑥ 传奉番汉僧道官也成了京师奇观。

成化二年十月，多年来在内阁及御用等监为书办的儒士凌敏、汪容等十一人分别传升为尚宝司、光禄寺、大理寺等官。^⑦ 成化八年十二月，命儒士杜昌于内府写书，不久即传升为鸿胪寺序班。^⑧ 传奉升授成了读书人在科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途径。

成化六年十一月，传升司礼监太监怀恩之侄马瑛为锦衣卫百户。^⑨ 成化八年五月，传升武襄卫勇士陈逮等三人为试百户，腾骧、锦衣诸卫千百

① 《明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八月辛卯条”，第 404—405 页。

② 《明宪宗实录》卷 35 “成化二年十月丁巳条”，第 701 页。

③ 《明宪宗实录》卷 84 “成化六年十月癸酉条”，第 1644 页；卷 106 “成化八年七月丙午条”，第 2067—2068 页。

④ 《明宪宗实录》卷 12 “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条”，第 264 页。

⑤ 《明宪宗实录》卷 147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丙午条”，第 2691 页。

⑥ 《明宪宗实录》卷 159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条”，第 2904—2905 页。

⑦ 《明宪宗实录》卷 35 “成化二年十月丁巳条”，第 701 页。

⑧ 《明宪宗实录》卷 122 “成化九年十一月庚子条”，第 2350 页。

⑨ 《明宪宗实录》卷 85 “成化六年十一月丁丑条”，第 1645 页。